

读两种刻工录

李 炳 震

在中国古代印刷史的研究中，刻工资料，是一座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的宝藏。我国近现代学者李盛铎、傅增湘、张元济、赵万里、王重民等诸位，在古笈版本目录学研究中，都甚重视刻工资料。但载有刻工资料的宋元珍、善、孤本，大多收藏在我国各大图书馆，且这些古笈又只有少数有影印本传布，故一般研究者难于见到研究专题内较全面的刻工资料。所以，辑录刻工资料的工具书，就成为学界所必须。然而，从众多的、分散的古笈中辑录、排比、辨别、考证刻工资料，是一种烦琐费时的资料性工作，非有蜡烛精神，则不能为。迄今，已刊布的刻工资料实在是太少。本世纪三十年代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成《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》，录宋元刻本203种，刻工名字约2050人。半个多世纪来，此表成为学者研究宋元版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。然该书只是依据日本所藏部分宋元刊本编录而成，刻工资料自然难求完备。后来张秀民先生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355种及上海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天一阁藏宋本数十种辑成《宋刻工名录》，又得刻工700人，可补长泽规矩也书之不足，惜至今未刊布^①。本世纪五十年代冀叔英先生编有明代徽州地区、苏州无锡地区刻工表，各录明刻本50种，分别录刻工130人与377人^②。近年冀先生又编有《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》，录明刻本109种，刻工姓

名557人^③。目前，在我国古笈研究整理日益兴盛的形势下，刻工录的编著亦趋活跃。张振铎先生编成了《五代宋辽金元刻工名录》、《明代刻工名录》、《清代刻工名录》^④。王肇文先生出版了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。李国庆先生发表了《宋版刻工表》，载于《四川图书馆学报》1990年第6期。上述各种刻工录的问世，为我国古代印刷史的研究，增添了可贵的资料，编者劳绩非浅，必将遗功后世。下面略谈谈对后两种专录的读后感，并就教于方家。

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录宋元刊本370种，刻工4500人，较之长泽氏之表刻工人数增加一倍以上，资料大为丰富。该书内容编排分两大部分：前一部分为按四角号码检字顺序排列刻工姓名，每名刻工名下系以所刻书名、版本及其代号。后一部分为采用书版本简介，介绍刊刻时地、主持者及版框尺寸、行格，并系以刻工姓名。这样编排的体例甚好，既可使读者明瞭一名刻工毕生（就今日所见）共刻书多少，又可知某一书刻工的姓名和人数，检索起来颇为方便。《宋版刻工表》录宋本444种，刻工5000人，其中有元明补版刻工。采用之宋本较前者为多，所录宋刻工，亦稍多于前者。内容编排亦分为两大部分：前一部分为引用书简介，列书名、版本。后一部分为按汉语拼音音序顺序排列刻工姓名，每名刻工名下系以所刻之书。这样编排，检索一名刻工所刻之书简便，但如查检某一书由哪些刻工刊版则不便。这两种刻工录所收宋刻工绝大多数相同，有少数彼有而此无，可互为补充。

有了较详备的刻工专录，可使研究者省去许多检索之劳。试举一例。日本内阁文库藏有一部宋刊《东坡集》残帙，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苏轼集的一个重要传本。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傅增湘观书后说：“此本行款版式与余所见宋刊数本皆不同，审其结体方整、雅近率更，自是南宋以后浙杭风度。陈氏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述《东坡集》刊本有杭本、蜀本、吉本之别，此断为杭本无疑”^⑤。

对于傅氏的论断，有人持不同意见，研究苏轼著作版本的一种专著在引录了该集的刻工后说：“以上刊工姓名，未见于其它宋刊本。故其刊刻时地无法从刻工姓名中求得确凿证据。然全书避宋讳至慎字缺笔，由此可知为宋孝宗时刻本。至于说它是杭本《东坡六集》之流散者，只是推测之辞，尚待进一步考辨。”^⑥

《东坡集》残帙刻工今可见者有李询、李宪、李忠、李师正、徐高、徐逵、周彦、高彦、赵通、王政、张谨、惠道等60人。查上述两刻工录，除其中10人不见外，其余50人均可考见。如李询、徐高、章宇、王政于绍兴十五至二十一年（公元1145~1151年）刻临安府本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；李宪、李忠、李师正、周彦、高彦、赵通于绍熙二年（公元1191年）刻两浙东路茶盐司本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；李忠、周彦、徐逵、张谨之名见于宋明州刊绍兴二十八年（公元1158年）补修本《文选注》中；李忠、李师正、惠道之名又见于庆元六年（公元1200年）绍兴府刊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。以上《东坡集》的部分刻工十余人大体活动于十二世纪后半叶，所刻之书皆为浙本。因此，可定其为浙本，傅氏之说不误。亦可证其刊于南宋孝宗（公元1163~1189年）之世。

下面就刻工录编录中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，笔者不揣浅陋，略陈浅见，请专家指教。

一、单字刻工是否收录问题。宋元刊本多数有刻工姓名，但有些刊本中往往有的刻工只有名或姓中的一字留下来，对于这样的单字刻工是否应收入刻工录？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和《宋版刻工表》均未收入，理由是“单字重名太多，不予收录”。究竟要不要收入，应当以研究工作是否需要为准。过去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中，学者们往往利用刻工资料与其它资料相结合，来判定佚去序跋、无刻书牌记的古籍的刊刻时地，从这一用途来讲，单字刻工因重姓、重名太多无法判定其所属的时代和地区，所以对鉴定一书的版本无用，可以不录。但刻工资料的价值并不止

此。我们还可以根据一书刻工群体的特点，如时代性、地域性、家族性、稳定性、流动性和群体规模，来从宏观上考察某一时、某一地区、某一出版者经营的出版印刷业的组织、规模、刻印的速度等，从而探索印刷业的发展状况。如宿白先生的《南宋的雕版印刷》^⑦就较充分利用了刻工资料，深入研究了南宋这一我国印刷业发展的重要时期，两浙、福建、四川、江淮湖广各地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情况。因此，对于单字刻工资料是不可忽视的。如元刊宋孟元老《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》，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中录刻工有：吴明、姚宏。又引《宋元刊工表》增江叔度、吴甫。实际上此书刻工远不止此四人。据傅熹年先生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观书记载，此书刻工有：“吴明、姚宏、丁、元、良、娄、魏等”^⑧。综合起来，此书刻工共九人，其中单字刻工五人，超过半数，从刻书规模与速度来看，四人与九人刻书绝不一样，九人比四人刻书，其速度要快一倍以上。再如，宋刊《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》，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引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记刻工有王朝等二字姓名者六人，而删落了其引录书中已记出的单字刻工于、范、单、志、庆等五人。如果据两字刻工人数来推断此书的刻书组织规模和成书速度，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。在宋元刊本中，刻工姓名留下单字者并不少见。据张秀民先生说：“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根据日本所藏宋本书一百三十种，查出宋代刻工姓名约一千七百人。除去一字姓，或有名无姓者，实得一千三百人。”^⑨这里的统计数字是，单字与非单字刻工的人数比为4：13，化成百分数为30%强。也就是说，单字刻工约占三分之一弱。由此看来，单字刻工忽视不得，删落了则是一大缺憾。

二、关于残帙的刻工著录问题。依据刻工资料来研究问题，一书的刻工著录是否准确，直接关系到研究问题所得出的结论。流传至今的宋元刊本，多有残缺、补配的情况。因此，为了刻工

资料的准确性，必须予以注意。《宋版刻工表》中对所采录的宋本卷帙完缺、补配情况未予注明，此为—缺憾。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大多情况下对采录原书的卷帙缺佚作了说明，但尚有少数情况有遗漏。如书中记宋本《三国志六十五卷》有刻工王彬等四人。此条资料引自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查后者，已注明只存《魏书》卷廿十九、三十两卷。原书既只存两卷，残缺如此之甚，王彬等四人当非全部刻工。如不注明该书的残缺情况，这里列出的四名刻工容易使人误认为是该书的全部刻工，如据此立论，当然谬矣！

三、关于原版、补版刻工的著录问题。今天所见之宋元刊本，有些并非初印，而是书版递经修补后之印本，在补版中也往往留下了刻工姓名，所以刻工有原版、补版刻工之别，著录时应尽可能地将原版、补版刻工区别开，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。《宋版刻工表》中对元明补版刻工予以采录，但未予注明，对研究者利用实有不便。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中已注意区别原版、补版刻工。如注明一书中有“原版刻工”、“补版刻工”；或“版心记字数的刊工”、“版心不记字数的刊工”；或“刊工分三期”等等，这样既使资料准确，又方便利用。但亦偶有不足。如采录宋刊本《东坡先生后集》二十卷，录刻工有王九、阮吉、吉父三人。资料来源于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傅氏在著录中已注明该书只存三卷，刻工除上述三人外，还有单字刻工元、仁等十人，虽已注明有“庚子重刊”、“乙卯重刊”者，对刻工所属，却未予区分。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照录两字姓名刻工三人。实际上这十三名刻工中，乃有元、仁等六人为“庚子”、“乙卯重刊”之补版刻工^⑩。又如宋刊所谓“山中一半雨”本《王右丞文集》，录有刻工江陵等十人。据傅熹年先生研究，此本原版并无刻工姓名，记刻工姓名者乃是补版书叶。初补者字体近于南宋初江西刊本，如第二卷第一页；再补版者字体方正，近于浙刻本，

如卷一首叶及卷七首叶”^⑩。是该书补版亦非一次，其刻工所属，应予注意。

刻工专录，作为一种工具书，随着资料的新发现和采录，它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和详备，从而将更好地为印刷史的研究服务，它的价值也因之能更好地体现出来。

注：

①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第三章。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第版。

②冀叔英《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》载《文物》1959年第3期。

③冀叔英《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问题》载《文献》总七辑。

④张尔安《书海寻珍五十秋，硕果累累遗后人》，载中宣部出版局编《发行家列传（一）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12月第一版。

⑤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三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9月第一版。

⑥刘尚荣《苏轼著作版本论丛》，巴蜀书社，1988年第一版。

⑦载《文物》1962年第1期。

⑧傅熹年《参观静嘉堂文库札记（上）》，载《书品》1991年第1期。

⑨同①。

⑩同⑥。

⑪傅熹年《参观静嘉堂文库札记（下）》，载《书品》1991年第2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湘潭钢铁公司职工中专学校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